

## 书评冈本隆司著《中国<反日>源流》

村上卫

(京都大学准教授)

- ◎ 原文刊载于「日」『中国研究月報』中国研究所、第65卷第12号,2011年,39~42页。
- ◎ 欧文东译
- ◎ 原书为『中国「反日」の源流』,讲谈社,2011年1月,250页。

“对中国历史漠不关心的学生增多了。”这一说法由来已久,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至少自1989年第二次天安门事件之后,日本人就开始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感到不适。就近几年的反日运动来看,其原因形形色色,先是1999年在浙江大学发生的反日运动,接下来是2003年在西安(西北大学),最后演变成2005年的反日游行。再后来是2008年,日本发生了中国“毒饺子”事件,2010年在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洋面上发生渔船冲突事件。这一连串的事件不仅使日本年轻的学子,就连日本的普通民众也开始对中国有强烈的反感,甚至失去对中国的兴趣。现在,除了商务和负面描写中国等的书籍,仅因书名中出现了“中国”二字,该类书籍被问津的几率就会出现下降。在此状况下,仅靠描述“平稳时期的文化交流抑或困难时期的利益抗争(230页)”已经很难把那些不愿关心中国的人吸引过来并使其成为新的读者。当然,此类描述也并非该书写作的指针。

面对现状,正如该书(7-8页)所阐述,或许我们没有什么速效法去改变它。但是,日本人之所以不关心中国或许是因为厌恶中国并对中国深感不适所造成的。包括书评者自己在内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常常有“以前日本也是那样(如现在的中国)”的议论,但因现在的中国没有走战后日本同样的道路而几乎失去了说服力。如此一来,我们倒不如明确承认日本与中国的差异、从历史的角度弄清两国的差异并将其通俗易懂地展现给普通的读者,这也许就是中国近代史或近现代史研究者的重要使命吧。为了探究中国反日的深层构造,该书“没有局限于日中某个时期的政治,而是记述包括经济、社会和思想在内的整个历史”(该书第8页),并通过日中比较进行难能可贵的学术尝试。

该书作者因其两部大作《近代中国与海关》<sup>①</sup>(名古屋大学出版社,1999年)和《属国与自主—近代清韩关系与东亚命运》<sup>②</sup>(名古屋大学出版社,2004年)而分别在经济史和外交史的研究上有巨大贡献,而且还出版了注释详尽、富有启迪的译著《马建忠的中国近代史》<sup>③</sup>(京都大学学术出版,2007年),出版了启蒙著作《世界中的日清韩关系史—交邻与属国、自主与

---

① 原著『近代中国と海関』

② 原著『属国と自主のあいだ—近代清韓関係と東アジアの運命』

③ 原著『馬建忠の中国近代』

独立》<sup>④</sup>。此外，冈本隆司还与川岛真合编了《近代中国外交之萌动》<sup>⑤</sup>（东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一书，而且发表论文甚多，一直是近代中国史研究的引领者。该书的面世得益于上述深厚的研究积淀，是一部希望立足于诚实性和学术性作品的书籍，与充斥街头巷尾“反中书籍”层次完全不同。

该书的篇章结构如下：

序

第一部分 “近世”的日本与中国

第1章 十八世纪的东亚

第2章 统治结构

第3章 由明到清的朝代更迭

第4章 宏观动向

第二部分 “近代”的开端

第5章 迎来十九世纪

第6章 邂逅西方的近代

第7章 开放通商口岸与打开国门

第8章 动乱时期

第三部分 近代日中的相争

第9章 近代日清关系的开始

第10章 日清对立的加剧

第11章 “洋务”时期

第12章 反日爱国运动的开始

结束语

从篇章结构可以看出，该书不仅把近代史和整个清朝作为其研究对象，而且还把明朝纳入了考察的视野。日中比较是贯穿其中漫长时间维度的主线。以下将根据该书内容，试着概述日中之不同点。

首先，就日本江户幕府的统治而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距离很近。因为在日本社会的背景之下，权利统治需寻求与自立社会体的合作，而社会体自治如若没有强制性的权利统治则无法确立（27-30页）。

在经济方面，由于幕府限制与海外贸易，江户日本对自然资源进行彻底循环再利用的经营方式——“封闭系统”——得到了持续不断的自我完善与发展。最后，以“封闭式系统”

---

<sup>④</sup> 原著『世界の中の日清韓關係史——交隣と属国，自主と独立』

<sup>⑤</sup> 原著『中国近代史の胎動』

为基础，日本建立了国家规模的市场经济体系，政治和经济于是出现了密不可分的关系（69-78页）。

而在清朝的中国，国家与社会处于游离状态，没有出现日本那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相互合作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民生听凭“家族”、“乡团”和区域社会等等的照料和统制（33-37页）。

另外，清朝的经济也与日本不同。17世纪末期，清朝撤销禁令，重启贸易。随着与西方贸易的开展，大量白银流入清朝，经济空前繁荣（66-72页）。在商业化发展的中国，由于清政府不愿介入民间的经济活动，虽然其流动性扩大，但同乡同业团体、宗教和秘密结社等中间团体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导致政治和经济互相背离（78-82页）。

如上所述，在构建不同体制中讴歌太平盛世的日中两国，在迎来19世纪之际双双出现转折。在中国，伴随人口增多，移民潮引发白莲教之乱，导致地方军事割据。而在日本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叛乱等，但人口增长、高物价和专卖制却动摇着其“封闭系统”（88-98页）。在此过程之中，两国开始与西方的近代邂逅了。

就是与西方建立关系方面，日中两国也有不同。本来，在“开放通商口岸”与“打开国门”之前，日本因“锁国”政策与外国的接触较少，但官民均热衷于收集外国信息，并有组织、有系统地对其进行吸收。相比之下，与外国人、物和信息接触机会得天独厚的中国，利用外国信息却出于实用本位主义，致使外国信息无法推广到整个社会之中（105-118页）。

再者，虽然清朝和日本幕府都要与西方诸国缔结条约，但清朝的态度没有变化，依然不按西方的意图解读条约，且无意接受主权国家之间对等和并立的国际关系（126-128页）。然而，日本却结合西方的意图解读条约，将消除不平等因素的能量转化为推动幕府末期时代变迁的原动力（132页）。

就这样，由于政治与社会游离，流动性较强，具有柔性结构的中国吸纳“开放通商口岸”带来的“冲击”之后未呈现巨大变化。而凝聚力较强且具有刚性结构的日本却因受到“打开国门”的“冲击”，开始谋求结构上的彻底变革。这种对“西方冲击”的“反应”差别成为日中对立的根源（130-134页）。也就是说，此后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重建整个国家体制，而在几乎同一时期的中国，“同治中兴”不过是平定了以太平天国为首的內乱。在镇压叛乱中表现突出的督抚因取得财源而拥有行政裁断权和发言权（146-149页）。中国的这一历史进程与走向中央集权体制的日本大相径庭。

这种由督抚推动的洋务运动，之所以从国家与社会游离的角度看面临困难，是因为它与明治日本的殖产兴业相比，二者的结果不同（195-211页）。而且洋务运动的中心人物李鸿章之所以敌视日本，也是因为他害怕近邻日本的西化步伐（212页）。甲午中日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的结局印证了李鸿章的担忧并非多余。

那么，日本和清朝的中国又是如何走向对立的呢？在此问题上，作为该书另一特色的外交史显得尤为重要。该书仍从江户时代的日本和清代的中国说起，并重点阐述两国外交理念

的不同。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也将“日本式华夷秩序”规定为日本的“世界”观（158 页），而中国则沿袭了“倭寇”以来的对日观念，加深了对西化日本的戒心（168 页）。有观点认为《日清修好条规》是根据对等关系缔结的，但在清朝的中国看来，它是日本为避免“所属封土”朝鲜遭到入侵而签署的条约。然而，当时的日本却完全没有将朝鲜等“附属国”的问题列入考虑范围。

不过，此矛盾并没有被消除。作为朝鲜甲申事变的结果，日清政府间签署了《天津条约》（1885 年）。该条约在遏制两国使用武力方面发挥了 10 年作用，但最终还是没能防止日清战争（中国称甲午战争）的爆发。后来，在义和团运动中趁机占领东三省的俄国与日本发生冲突，日俄战争爆发。战胜国日本意欲接管俄国在中国的特权，但遭到希望成为近代主权国家的中国人民的抵制。日本打算以“满洲”为中心，坚决保护在中国的特权，扩大势力。结果，日本越想这样做，中国人对日本就越反感。这就是反感局面的最早出现。因此，该书作者将之看做是自 1905 年迄今的日中关系的出发点（224-227 页）。

如上所述，该书站在漫长的历史视野比较日中两国的体制，并将其中的差异与近代日中关系实现关联，最后清晰地阐述了日中两国走向最终对立的过程。虽然迄今也有人进行日中比较史学的研究，但其研究范围仅局限于某个特定的时代和领域，像站在“近世”<sup>⑥</sup>到近代<sup>⑦</sup>这一历史长河来进行比较的还几乎是空白。其背景中有出于对日本先进、中国落后这一二战前思维的反思，以及因此而慎重对待日中比较的问题。但是反过来，这又极有可能成为日本人自说自话的中国近代史，或者使之远离中国史的研究方向。该书能摆脱上述束缚，汲取最新研究成果，并面向大众通俗易懂地讲述日中比较史。从这一点上看，该书的贡献也很大。

另外，该书还成功地把“近世”之前日中两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之不同与“近代”日中两国的政治对立巧妙地联系在一起。这在学术上是一个“绝活”，如果作者的专业背景不是跨越政治经济史和外交史，研究的时代也没有跨越明朝和中华民国，他恐怕很难去完成。

如上所述，该书的贡献非常之大，但也有因记述简单，解说不够充分之处。譬如，就拿与欧洲的比较而言，书中 20 页写道：从 19 世纪拿破仑上台至卑斯麦时代，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且一直没有停止过。其实，欧洲内部最激烈的战争发生在法国大革命到拿破仑没落（1815 年）这一段时期。之后，只要是关于欧洲内部，我们就可以这样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一直没有发生全面战争，19 世纪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度过。倒是在亚洲，大规模的战乱可以说是接连不断，内部战争减少的欧洲抢滩亚洲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再有，虽然书中认为，作为中国中间团体的会馆和公所等同乡同业团体与西方中世纪的行会似是而非（80-81 页），但是，书中却没有对西方的行会进行说明，因此很难让人理解二者有何不同。

在经济史方面，书中认为：明朝，特别是在 15 世纪，民间经济对政府的货币制度和现货

---

<sup>⑥</sup> 日本的近世相当于中国的明末清初至道光咸丰时期。

<sup>⑦</sup> 日本的近代通常指明治维新至太平洋战争结束。

经济表现出不信任，致使国家与社会开始游离（45 页）。但是，国家与社会出现游离是否可以用货币制度进行衡量的疑问却留了下来。此外，书中还指出，一旦没有了鸦片贸易，不仅在产业革命中的英国经济，就连世界经济也难以为继（121 页）。但是，书中却没有提供当时的贸易额等具体数据，其说服力稍有欠缺。

虽说如此，鉴于该书属于篇幅有限的丛书性质，无法面面俱到实属无奈。并且，上述的琐碎问题也丝毫不会影响到该书的价值。

该书的特点是站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角度进行日中比较史的研究。因此，它今后有望成为一种学术刺激，在日本史研究者、西方史研究者，或者亚洲其他地区的研究者之间产生争鸣并对比较史研究开展讨论。

譬如，在近世，同时期的日中两国看起来都在讴歌太平盛世，但是德川幕府的和平维持了 250 年，而清朝限于本土的和平也仅在 18 世纪延续了 100 年。或许，我们可以就日中两国秩序的形成、瓦解及重构中出现的类似点和不同点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另外，该书的主线是日中比较，通过把欧洲、印度、西亚诸国等其他地区纳入比较对象，或许能让我们对日中两国做出均衡的定位。不仅排除“日本特殊论”和“中国特殊论”会变得容易，而且在中国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也会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

最后希望这类研究的发展能还原给社会，至少，日本会因对中国理解的加深而减少单纯以反中为目的的图书的发行。